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成果
【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董晓萍主编



数字 碑刻民俗志

SHUZI BEIKE MINSUZHIZHI

鞠熙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综合性成果
【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董晓萍主编

数字

碑刻民俗志

Shuzi Beike Minsuzhi

鞠熙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数字碑刻民俗志 / 董晓萍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

ISBN 978-7-303-09734-0

I . 数… II . 董… III . 数据库－应用－碑刻－风俗－
习惯－地方志－研究－北京市 IV . K892.4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90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30 mm

印 张：28.75

字 数：485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杨帆 蒋俊芳

美术编辑：高霞 装帧设计：大象设计 + 吴传友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李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丛书总序

董晓萍

中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领域的开基宗师，“中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是其中青年后学团队接续衍生的科研项目，本丛书是该项目成果的组成部分。^①

一、基本思路

现在讨论中国民俗文献史，有两种理念。首先，从历代文献中剥离民俗资料而成史，这是一项不可逾越的基础工作，它主要是由前辈学者完成的。钟先生晚年提出中国民俗学派学说时，已对它的独立意义和学术价值作了总结。20世纪以来，在海外汉学界，已有康德谟(Max Kaltenmark)、谢和耐(Jaques Gernet)、杜德桥(Glen Dudbridge)、欧达伟(R. David Arkush)、石泰安(Rolf A. Stein)和劳格文(John La-

^① 中国民俗文献史项目的研究，与另外两个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和“传统行业技术与社会网络”结合进行，法国学者吕敏(Marianne Bujard)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分别为两个项目的法方主持人，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方的主持人。本丛书的几位作者鞠熙、周锦章、舒燕、赖彦斌和吕红峰等先后参加了合作项目，担任研究生助手，并曾得到两位学者的指导，特此说明并致谢。

gerwey)等一批学者,^①研究我国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找到了讨论中国民俗社会和民间小人物的不少好课题,他们都从国际学坛呼应了我国民俗学者的工作,有的还与钟先生有过学术接触。这批中外学者的一大成就,就是在民俗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筚路蓝缕,建立了它的资料系统和一套处理资料的方法,将之变成学问。他们的著作不仅对我国民俗学有启发,也在我国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研究领域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次,按照民俗事象的自身观念和行为系统建史。按照这个理念,学者要对民俗本身的资料形式和内容含义加以描述和研究,而不是仅仅依据历史文献去做民俗史。它不是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前人打地基之后进行工作,前人的成果是它须臾不可忽视的学术史。从资料上说,我国也历来存在着历史文献与口头传统交叉互渗的事实,完全脱离历史文献建民俗史是空谈;从民俗学的方面看,依靠口头传统资料去写民俗文章是可以的,但若建“史”,也还是不科学的做法。本丛书在前期研究和现实准备的基础上,在将两者汇合的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民俗史的概念,主要是以民俗自身的观念、解释、结构、分类和功能系统为主体,在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下,审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和现实田野作业中的民俗记录两者,建设以民俗学研究目标为主的、历史文献与民俗志相结合的民俗史。它区别于次生于历史文献的民俗史,也区别于单纯强调口头传统的民俗史。它在新理念的框架下,根据我国实际,将文献与口头资料综合起来建史,故称“民俗文献史”。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尝试解决三个问题,以使这一研究形成完整思路。

第一,分期与分类。建史,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分期。但是,从原则上说,民俗是不能按照历史文献的分期法去分期的。所谓唐代的民俗不等于隋代没有,老百姓也不是按照历史朝代去考虑该不该传承包饺子和祭祖宗的民俗的。给民俗事象做历史分期是学者的想像,它能满足于学者的书面阅读习惯和传统治学方法,却不适合于在人生文化和社会整合中代代传递的民俗。民俗是一种对人类利用自然和文化的观念与行为产生连续影响的人文现象,是连续同一体文化,历史性是它获得学术权威性的策略,它在本质上又是日常形式的动

^①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献并涉及中国民俗资料的,例如: [英]杜德桥(Glen Dudbridge)《妙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 London: Ithaca Press, 1978。[美]欧达伟(R. David Arkush)《中国民众思想史论》,董晓萍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法]龙巴尔(Denys Lombard)、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二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法]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6。

态文化，以传统而时尚的方式传承，所以才能代代抓人，这与正史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追求的静态文化性质不同。与民俗史不同的是，民俗学史的研究可以分期，但这种分期也是要极其谨慎的，要建立使用历史文献的原则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否则就会假学者之手，把民俗的形式和本质给割裂了。从前从历史文献中剥离民俗的某些做法，把民俗变成了静态历史，也殃及民俗学史。在本次研究中，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并不忽略民俗学史的历史遗产，但在建设民俗史中，主要在从历史文献中钩稽民俗记载时，还做到补充和完善以下三点：①列出围绕被认定民俗要籍的其他文献要目，包括反映社会上下文的文献，以及文学、农学、哲学、宗教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史料，形成整体文献系统；②补充历史上已形成的民俗文体文献，如“风土记”、“岁时记”、“志怪”笔记、“水利簿”、“人物志”、“竹枝词”和“俚言解”等，按照这种民俗文体的原有分类，进行跨历史的纵向归纳、描述和分析；③将以上两种文献综合观察，描述和分析我国民俗文献的形成方式、文献化过程、解释价值和社会功能。再按民俗分类，并根据现代民俗学的基本问题，设题成史。以往的民俗史已有通史或断代史，但它们缺乏对分期和分类的差异的认识和讨论，没有建立搜集、使用历史文献和民俗文体文献的各自原则和综合分析方法，缺乏对社会上下文和相关学科史料的交代，这是不够的。本次研究希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改进。

第二，恢复民俗社会研究目标。做我国的民俗文献史，需要有比较明确的学术目标，不能为民俗而民俗，或为文献史而文献史。没有学术目标的建史，即便另有想法，也不会对学术发展真正有所增益。本次研究是要恢复一个民俗社会的结构框架，讨论在民俗社会的结构中民俗文献的内涵和价值，而这正是从历史上到现在的学者都关心的问题。进一步说，我们要尝试解释民俗文献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在民俗社会中历史文献被使用的意义，口头传统与文字文化的复杂关系，民俗被地方文献化的过程和利用途径等。我们还试图说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人、事原型，与民俗文献中的自然、人和社会的原型，以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人、事与自然风物资料三者的关系等。总之，通过这类努力，揭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文献文化现象，指出民俗文献的生命力。

第三，避免海量信息垃圾。在现代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下研究民俗文献史，不仅有历史文献和口头资料两个庞大系统，还要对它们的分类方法、使用原则、描述逻辑进行分析、从资料中提取民众知识专题库，所获信息是海量的。如果不控制信息容量而上手开工，项目结项就是天方夜谭。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计算机的数据库技术和GIS技术等给我们帮了大忙。本项目的全称是“中

国民俗文献史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其中后半句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含义指此。数字化可以促成更优胜的分类逻辑和储存理念，不仅能给信息文本减肥，还能给学者节省大量的时间，加快研究进度，并能将预期成果在数字运行环境下演示再现，形成新的研究平台，好处不少。当然，要使这种理工科技术在文科使用得当，还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探索。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就做了其他两个相关的项目，以寻找“民俗文献史”与“数字化系统管理”的最佳结合点：一是针对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辑录作数字化，目前已从历代地方志切入，搜集传统节日史料，建立节日民俗文献数据库；一是针对民俗文献和口头传统中都稳定存在的故事记录作数字化，重点从20世纪钟敬文先生等前辈的故事研究著述和使用资料切入，建成中国故事集成县卷本基本词数据库；现在这两个项目的完成，都为本丛书的整体成型支付了成本，也作了必要的积累。事实证明，只要文本研究扎实，再借助数字化，数字化就能给文本研究插上翅膀。

二、突破点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研究和数字化管理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一些难题，可以促进现代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及应用研究。

在理念上，钟敬文先生所倡建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是本次研究的重要支撑，但这个草图还需要后学去填充。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我国民俗文献史的系统搜集、整理、研究，扩大了以往民俗史的研究领域，还可以为加强民俗学史的建设打底。这有助于进一步发展钟先生的学术设想，丰富中国民俗学派的内涵。在本丛书中，《数字钟敬文工作站》一书对此作了详细阐释。

在体例上，以往民俗学界做民俗史，主要根据文人文字记录对民俗史料作分期、分类和分门别类的解释。中国民俗文献史突破了这一模式，引入了民俗文献的概念，根据民俗文献被民众理解和民俗社会应用的实际，作重新分类和学术解释。另一方面，本次研究也指出，在民俗记载上，文字文献与民俗文献之间具有共同点，也有差异面和多层次的区分，在新的分类体例下，对它们可以作更精细的研究。

在资料上，本次研究有三个关注点。首先，历史上的文人文献有对民俗的情感、直觉和“当时性”的描绘，并累世汇集成了由无数个“当时性”片段组成的地方史，在后人无法对历史民俗现象作田野调查之处，它们都成为后人认识民俗史的第一手资料，这点是与上层正史不同的。在研究和撰写中国民俗文献史中，我们指出，任何文献都是识字阶层参与的结果，因此需要指出历史上的文人观念和现代学者观念对造成民俗文献的作用。我们还应力求对上述资料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批评，以说明中国民俗文献被记录和保存的内在规律，探求民俗文献形成和流传的本质。其次，对有些民俗文献，如有条件作田野作业，

可以开展田野调查，这样往往能得到其他收获，至少可以看到现实社会中历史文献被保存下来的民俗观念的传承变迁和现实应用活动，有利于将文字中看不到的民俗含义揭示出来。再次，对民俗社会的口头传统资料也要保持距离。它们固然传达了民俗信息，但也要看到它们受到地方化过程的限制，又被选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解释，以及由此发生的变化；要指出它们在地方运作的鲜活资料，帮助读者看到民俗文献能“活”下去的理由。本丛书基于上述思考，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这种工作迄今少见。

三、方法与方案

本丛书对以往民俗学的方法论扬长避短，在新理念的指导下，采用了民俗分类、整体观照和数字管理的新方法开展工作；在方案上，采用“建库”、“建志”和“建个案”的三步并综合进行。

“建库”，指“建学术史库”。在各子课题中，对该子课题所涉及的前辈学者研究问题和前人所使用的资料，尽可能地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前人没有从本次研究的角度作工作，故各子课题所实际涉及的资料其实并不是过多的，而是可以被控制的。同时，各子课题也注意国际同行对相关民俗文献的主要理论争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并在这一部分中，有所对话或讨论。

“建志”，指“建民俗文献志”，或子课题所研究的“民俗志分类专题库”。它包括在该分类事象上的历史文献记载、口述史、民间碑刻、民间行业、民间技术会章和民间社会组织史料等，作者要将它们建成大体完整的专题民俗志系统。在这方面，还要考虑我国民俗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多元性，所以该库的范围要限定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内。在描述和研究上，还要与相关学术史问题进行观照。例如，在《数字行业民俗志》一书中，就对传统手工行业的民俗文献和现代传承的基本问题作了研究。

“建个案”，指各子课题在对田野个案点的调研基础上，完成资料系统的建设和研究。个案点的选择，应该是将学术史、民俗分类专题库和田野作业资料贯穿起来的地点。当然，不是所有学术史上讨论的历史文献都能找到对应的个案，也不是所有民俗分类专题库的资料都要作田野调查，更不是现在热闹的民俗地点就适合成为个案。本丛书所选择的个案点是历史成就、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的统一体。例如，在《数字碑刻民俗志》中，便根据明清碑刻铭文的线索，对照民俗分类调查资料，同时根据地方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俗遗产地点，确定了猪行、纸行等个案。

在理论呈现上，本次主要开发了 WebGIS 自带数据库，辅助民俗的文献储存、管理和研究。在各册书的撰写中，还都增加了数字辞典，也有的编制了

数字民俗地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仅以数字辞典为例，由于民俗文献史的内容涉及面广、文献保存介质复杂、学术史问题多、个案时间跨度大和民间用语极为丰富等，在撰写著作中，很容易出现驾驭失控、成果散包，或者失去目标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弊病，我们在每本书中都做了数字辞典，附在书后，供读者查询。数字辞典的功能有三：一是管理各书及其子课题的民俗文献编制目录、搜索引擎和民俗分类表述系统；二是介绍各书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专业术语、历史文献提要、民间用语的含义，防止因子课题中的历史词语、现代概念、项目术语和民间语汇混合共用，所可能出现的歧义纷纭的弊病，也避免将不同性质、不同时期和不同介质的文献放在一起讨论，所可能产生的概念交叉和理论界定不统一的毛病；三是说明各书的资料和理论的整体结构系统和研究方法。各书的数字辞典数量不一，视研究内容而定，如在《数字钟敬文工作站》中，附有三个数字辞典，即中文版辞典、英文版辞典和书库数字辞典，在《数字碑刻民俗志》和《数字行业民俗志》等其他著作中，也各有一个数字辞典。^①

四、成果要目

本丛书是综合性系列著作，总称“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它们在成果性质上，都是中国民俗文献史研究的分类著作；在成果形式上，都是纸介著作、田野报告和数字辞典（或数字民俗地图）的三合一，整体成史。

还有一部分民俗文献史的子课题，侧重学术史上的基本问题，研究专题民俗文献史。但它们不是做以往民俗史上的断代史或通史，而是尝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梳理前人工作，补充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民俗文献，辅以口述史访谈和数据库，形成独立成果，例如：《抗日战争和稍后时期的民俗文献史：1937—1949》，^② 以及《建国初十年民俗文献史：1949—1959》，^③ 其他专题民俗文献史著作也将陆续完成。

中国民俗文献史的研究目前还只是“纲要”，后面还有很多科研工作要做。但仅就已完成的成果看，它的意义是明显的：在理论上，它能使学界同行和国人对我国民俗文献之博大精深增加认识；在社会环境上，它从调查、研究到撰写，都已不可避免地与我国正在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建设发生联系，这些背景给我们以激情和后劲。

^① 本丛书的《数字碑刻民俗志》和《数字行业民俗志》两册在出版时，限于字数，其数字辞典原文未刊，将另行出版，但这两册书都保留了数字辞典的方法讨论和方案设计内容，以保持成果的完整性。

^② 庞建春：《抗日战争和稍后时期的民俗文献史：1937—1949》，打印稿，2005。

^③ 黎敏：《建国初十年民俗文献史：1949—195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碑刻民俗志的概念与性质	58
第一节 碑刻民俗志的概念	59
第二节 碑刻民俗志的性质	74
小 结	105
第二章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记载的民俗文化	107
第一节 碑刻文本中的民俗内容	108
第二节 碑刻民俗的承担者	138
第三节 碑刻民俗的空间描述	186
第四节 寺庙碑刻记载的故事类型	194
小 结	229
第三章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民俗的个案研究	234
第一节 个案选择及个案研究的切入点	235
第二节 碑刻隐含的政府管理与行业 权力关系	241
第三节 碑刻背后的宗教寺庙与民间 商会关系	275
第四节 碑刻传承的僧人组织和公共 领域关系	306
小 结	332

第四章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民俗数据的处理	336
第一节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基本思路	337
第二节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框架与结构	357
第三节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368
第四节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数据标准理论与检测	380
小 结	390
余 论	392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399
附录二 本书主要使用的碑刻目录	406
后 记	437

插图目录

(一) 正文插图

图 1 碑刻民俗空间描述的示意图	193
图 2 西四真武庙建筑示意图(1930—1949 年).....	246
图 3 清代西四财神会三行组织关系示意图	253
图 4 民国猪肉业三行组织关系示意图	255
图 5 清代北京旧城猪市和祭祀组织的分布示意图(1709—1849 年).....	265
图 6 民国猪肉原料产地与猪市分布叠加示意图(1919—1953 年).....	267
图 7 国子监街火神庙建筑示意图(1888—1950 年).....	280
图 8 1837 年火神庙捐资范围示意图.....	283
图 9 火神庙周围丧葬行业分布示意图(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	286
图 10 白塔寺夹道鸿顺堂彩局关系户分布示意图(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	288
图 11 国子监街天源号棚铺记账商铺分布示意图(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	291
图 12 清代至民国棚匠行会公祭鲁班的寺庙分布示意图(1752—1919 年).....	295
图 13 国子监街民俗共同体与寺庙的关系示意图	302
图 14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四方向采集处理数据的方案模型	339
图 15 碑刻文本相关性分析软件操作示意图	356
图 16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三库组配结构”示意图	358
图 17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一级元数据目录示意图	360
图 18 寺庙数据库元数据目录示意图	361
图 19 碑刻数据库元数据目录示意图	362
图 20 档案数据库元数据目录示意图	363
图 21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与其他数据库的链通互查关系示意图	367
图 22 从碑刻民俗志报告(含资料集)到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工作流程图	370
图 23 从碑刻民俗志数据库到数据库手册的数据处理流程示意图	371
图 24 碑刻原始数据的采集流程示意图	372
图 25 寺庙原始数据的采集流程示意图	374
图 26 档案原始数据的采集流程示意图	376
图 27 碑刻数字数据的处理流程示意图	377

图 28 寺庙数字数据的处理流程示意图	378
图 29 档案数字数据的处理流程示意图	379
图 30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数据编码标准示意图	382
图 31 数字辞典页面样本	389
图 32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系列手册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390
(二)封底插图	
图 1 清《乾隆京城全图》中本书重点研究范围示意图	441
图 2 《碑刻民俗志》田野调查个案范围示意图	442
图 3 《碑刻民俗志》术语数字辞典封面	443
图 4 《碑刻民俗志》数字辞典查询界面	443
图 5 北京市西城区西四真武庙《猪行公议条规碑》拓片(碑阳)影印图片	444
图 6 北京西四真武庙《猪行公议条规碑》拓片(碑阴)影印图片	445

表格目录

表 1 碑刻民俗志研究学术资料的范围列表	73
表 2 政府管理与碑刻民俗的交叉	84
表 3 文字文献对碑刻民俗的记载	90
表 4 民间故事与碑刻民俗的合流	95
表 5 碑刻民俗志对碑刻民俗的评估分级列表	101
表 6 职业型祭祀组织的寺庙碑刻与相关衙署的对应表	168
表 7 行业型祭祀组织的寺庙碑刻与行会成员对应表	171
表 8 庆典型祭祀组织的寺庙碑刻与香会名称对应表	173
表 9 社区型祭祀组织的碑刻与社区捐赠人对应表	177
表 10 碑刻民俗志处理碑刻民俗数据的属性要素列表	232
表 11 北京北城范围内有停灵治丧业务的寺庙分布与简况表	301
表 12 双关帝庙碑文内容一览表	323
表 13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四方向采集数据简表	339
表 14 碑刻民俗志数据库各库内容和使用资料性质简表	364

绪 论

本书研究北京寺庙碑刻中与民俗文化有关的部分，尝试通过分析碑刻与民俗的关系，主要探讨分析、整理和共享碑刻民俗的理论与方法，附带讨论北京城市民俗的某些特点。本书在梳理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重点以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为基本资料，从民俗志的理论方法切入，利用北京地方史志文献、政府档案、民俗现代记录本和田野调查等相关资料，综合使用民俗学的资料搜集与研究方法、文化遗产保护的共享工作方法与计算机辅助技术方法，尝试通过资料整体分类与民俗个案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城市社会组织民俗为切入点，以数据库为基本技术手段，以建立碑刻民俗志数据库和撰写民俗学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考察分析碑刻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发现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城市民俗发生联系的要点和特点，初步构建民俗志理论框架中的碑刻学术资料系统，进而探索民俗学管理和共享碑刻资料的理论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本书主要研究碑刻民俗志的理论与方法。碑刻民俗志在继承民俗志学说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科研究碑刻的方法，根据碑刻与民俗文化的实际关系，从民俗研究和资料体系两方面构建理论范畴，包括分析、管理和共享碑刻民俗三方面内容。碑刻民俗志在民俗研究范畴内，主要研究碑刻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本书将北京内城寺庙碑刻看作民俗资料的一种，从民俗学的角度探索它与城市民俗的关系，并探讨与之有关的城市民俗社会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总结使用碑刻资料的原则。碑刻民俗志在资料体系范畴内，主要探讨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学术资料系统的原则和方法，使碑刻民俗志的学术资料系统，既能再现碑刻民俗的原生态环境和深层文化脉络，又能提供多学科交流共享。本书将民俗学研究看作社会运行的一环，认为民俗学者搜集资料和理论思考的工作本身就参与了社会再生产，构建并共享民俗志学术资料系统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从理论上探讨这种过程的操作原则与行为标准，能够丰富应用民俗学的内容。本书认为，碑刻民俗志研究与碑刻有关的民俗，这和建立碑刻学术资料系统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这是因为，民俗学者建立的碑刻资料系统，不仅是对碑刻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更是对碑刻民俗的分类和整理，它要求民俗学者在梳理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碑刻资料的理论视角，总结碑刻数据的采集处理原则。并在分析资料和共享

讨论的氛围中，把学者自身当成工具，反思研究过程，改进学科理论，共享民俗文化遗产，这样建立起来的碑刻学术资料系统，既是民俗文献的资料库，也是民俗志研究的知识库，还是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数据库。

本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北京内城以内，以明清时期到1956年为时限，重点以约1750~1949年此段时间为主，以数字化技术，主要是数据库技术为辅助手段，以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为基础资料，参考2002年至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重点实验室研制开发的“中国民间故事数字博物馆”、“北京内城行业数据库”、“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三集成数字空间演示模型”等相关成果，从民俗学的角度切入，在学科理论探索和数据库设计实践两个层面开展工作，并初步尝试探讨相关的城市民俗特点。

二、选题价值和突破点

第一，本书将以往较少使用的城市民间碑刻作为基础资料，部分扩大了民俗学的资料范围，并尝试使用文体志的分类方法构建碑刻学术资料系统。金石学研究碑刻，重点使用对上层社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点具有重要纪念性价值的碑刻资料，对民间碑刻关注不多。^① 民俗学者研究社会下层文化，使用的碑刻集中在农村地区。例如，顾颉刚在研究京郊妙峰山香会、钟敬文在研究中国地方传说时，都曾使用当地碑刻作为辅助资料。董晓萍在研究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时，将碑刻作为主要研究资料，但她关注的是碑刻与缺水农业社区民俗的关系，没有涉及城市碑刻。而本书把城市民间碑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全面搜集北京内城寺庙碑刻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学视角分析碑刻中的社会史料与民俗内涵，打通上、中、下三层文化，建立碑刻民俗志的资料系统与研究个案。

同时，以往民俗志在构建资料系统时，往往以行政分类和学者分类为基本分类原则，或者按照统治权力的划分方式，以朝代更替和行政区划为基本资料范围，或者从民俗学的范畴出发，根据特定研究目标选择相应材料。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明确限定资料范围，确定理论视角，但缺点在于可能以学者自己的想象代替民众的声音，或者用外来理论代替中国本土实际，或者可能造成资料碎片化，看不到民俗事象实际存在的整体原貌。从历史文献和实际调查情况来看，碑刻，尤其是寺庙碑刻，是一类相对独立的民俗事象，不仅历史上已经

^① [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董晓萍、[法]吕敏(Marianne Bujard)：《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总序》，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形成相对稳定的“碑刻”文体概念，北京民众对这类事象也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因此，碑刻民俗志打通资料的历史朝代分期和传统文献体裁分类，以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碑刻”文体为基本分类范围，从民众自身的分类观出发，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民俗空间内，比较全面地搜集碑刻资料，形成关于这类文献的学术资料系统。在研究方法上，以碑刻民俗的文本分析为基础，通过碑文记载发现民俗线索，进而建立碑刻民俗志的个案，补充其他地方社会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交代社会背景，梳理文化脉络，并形成比较整体的民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通过分析整理碑刻资料，部分扩展了民俗学使用资料的范围，同时尝试了从资料本身进入理论思考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民俗学研究资料的方法。

第二，本书尝试探讨城市民俗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城市社会组织的特征，部分拓展了民俗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以来，民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对城市民俗的研究不多，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集中在香会和行会两个领域，尚未涉及其他组织形式，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个案。本书从北京内城寺庙碑文记载中发现民间社会组织的线索，以民俗共同体为主要关注对象，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城乡连续统一体的大背景和动态过程中，试图对这部分与碑刻有关的城市民俗进行个案深描，并尝试探索北京城市社会组织民俗的一些特征。

本书通过梳理与碑刻有关的北京城市社会组织民俗，发现北京城市社会既不同于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人在台湾、福建等南方社会所发现的，具有鲜明的“街坊祭祀组织”结构，^①也不完全是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妙峰山等处发现的，由于庆典而临时形成祭祀组织，^②北京内外城的差别也并不如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特别是在清乾隆中期以后，北京城市商业快速发展，围绕不同寺庙形成了不同功能的民俗共同体。城市市民以经济活动为基础，以民俗活动为表象，在不同寺庙中依靠不同功能的共同体协调社会关系，并始终保持与乡村社会的民俗认同。这样形

^① [英]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学宫与城隍》，见[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699～73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法]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旧台南的街坊祀神社》，见[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731～7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美]韩书瑞(Susan Naquin):《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周福岩、吴效群译，载《民俗研究》，2003(1)，75～107页。[美]韩书瑞(Susan Naquin):*Beij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成的城市社会结构，兼具网络结构和内部认同两种性质，它以长期居住为基础，但也以市场经济、社会分层和民俗认同为基础，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能抵御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和外界冲击。寺庙碑刻不仅部分记载了这些社会组织，还在文本之外隐含、强化和传承某些组织民俗，但碑刻资料本身有局限，必须结合地方社会的其他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以个案的方式进行研究。

第三，本书写作与碑刻民俗志数据库的建设同步进行，以数据库为基础的碑刻民俗志数字化平台，与传统纸介质相比，主要承担资料储存与管理、数据交流与共享、标准化检测三方面功能。首先，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碑刻学术资料系统，在储存海量信息的同时，以民俗学的地方文化整体观为指导，模拟碑刻存在的民俗志环境，打通碑刻与相关田野、文献资料的链接查询，把碑刻及其存在空间、文化含义与在特定文化中的作用联系起来。^①其次，利用数字化技术管理碑刻资料，根本目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共享，除了应用于本书学术研究之外，还直接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课题提供资料平台，或生成新的课题。因此，本书在资料建构上，引入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概念，使碑刻民俗志的资料系统和数据库平台，既能满足人文学科、政府管理和一般使用者的普遍需求，又能满足民俗学研究的专业需要。在构建资料系统的过程中，采用了中外合作，交流比较的工作方式，中外项目组成员在共同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北京城市社会研究，并得到各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海外汉学家等不同领域专家的指导、建议与检验。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管理资料，要求学术资料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标准化程度，本书吸收信息科学关于数据标准和数据共享方面的理论，从人文资料自身特点出发，根据人文学科本身的要求，为不同文献、不同学科术语建立通用查询平台，发展了信息科学中的相关概念，初步提出人文数据库的数据标准理论。

第四，本书将民俗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结合起来，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

^① 关于地方文化整体观，钟敬文在抗战时期曾指出，民间文化往往处在一种“未分化”的状态中”。以民间艺术为例，必须考虑到它的整体性。钟敬文：《〈民间艺术专号〉序言》，原作于1937年，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531页，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文革”后，在《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一文中，钟敬文提出了“总体艺术”概念，指出在按民俗事象的形式进行分类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俗事象的整体性。钟敬文：《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在昆明〈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思想战线》，1980(5)，见《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6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